

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

马 敏

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标志着欧洲最终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近代中国虽然并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但在明清启蒙思潮和近代西方思想双重影响下，又的确经历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过程，有着一批最早睁眼看世界、不乏真知灼见的启蒙学者与思想家。在近代启蒙思潮中，除救亡、科学、民主等喧腾一时的思想观念外，与工业化潮流和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的重商思潮^①也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潮流。以重商思潮为标志的近代商业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冲破封建专制的束缚，走向工业社会和实现近代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过程及其内容和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重商思潮与近代商业启蒙

关于近代重商思潮，史学界已有过许多详瞻的研究与讨论^②，但将重商思潮置于整个近代启蒙的大背景和长过程中来考察，凸现其在近代启蒙过程中的意义与作用，从思想史延伸到社会史，似还有可深入探讨的余地，也可藉此加深我们对近代启蒙运动更为全面、深入的思考。

对于什么是启蒙，各家有不同的解释。福柯倾向于将启蒙视作一个历史的过程：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3JJD770012)、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CNU13B007)的成果。

① 对近代重商思潮或重商思想，史学界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上，它主要指以“商战”为核心的重商主义思想，强调商业在对外贸易和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时间上主要指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时期。广义上，重商思潮或重商思想指的是既包括“商”，也包括“工”在内的“振兴工商”的思想，实质上是指重视实业或经济发展的思想，不再仅仅指重视商业，时间上则跨越晚清和民国初期。本文正是在广义上使用“重商思潮”一词。

② 这方面的成果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近期成果中对笔者有较大启发的论著包括缪文《晚清重商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8年)；冯筱才《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邱志红《近代中国商战思潮“新论”之商榷》(《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等等。

“不应忘记，‘启蒙’是一种事件或事件以及复杂的历史性进程的总体，这总体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①从近代西方历史发展过程看，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的兴起与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思想不无内在的历史联系。正是从15世纪末兴起的重商主义思想和政策，与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起，构成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起点，并为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奠定历史基础。如马克思所言：“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②

而在思想史意义上，如果将启蒙视作从中世纪不断迈向近代的思想解放过程，那么与文艺复兴运动具有早期思想启蒙意义一样，重商主义思想本身即为早期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反映了西欧封建社会瓦解和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它破坏了中世纪基督教宣扬的“守贫节欲”的道德规范，为不惜以一切手段敛财开启了道德之门，使资本一来到世间便“打上了血淋淋的烙印”；另一方面，它又重新阐释了财富的意义和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将对财富的拥有作为评价人类行为的最重要的价值参照系，宣扬金钱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样，就从根本上冲击了中世纪欧洲社会盛行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为财产私有、自由、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观念扫平道路。因为自由是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必要前提，平等则是商业活动的基本原则。如同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重商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相结合的结果，便是“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③由此可以清晰观察到重商主义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内在历史逻辑：启蒙思想家后来所大力宣扬的一些基本观念，在早期重商主义者那里几乎都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重商主义思想乃是启蒙运动历史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环节。

欧洲近代历史发展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如果从启蒙的视角来观察近代中国的重商思潮，我们亦可将之视作中国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之一。换言之，中国近代最早经历的也是商业启蒙的过程，商业启蒙是研究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话题。商业启蒙构成近代启蒙思想通往普通民众的一条思想通道，它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最为接近、关联度最高，因此也相对容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使平常百姓于不知不觉间受到近代工商社会价值观的洗礼，为适应正在发生的、空前的近代社会转型奠定一定的心理和思想基础。

① 福柯：《何为启蒙》，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5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4页。

③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38—139页。

有学者从哲学启蒙的角度，将明清以来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划分为五代。^①但实际上，就近代思想启蒙的内容而言，似还可在鸦片战争前夕主张经世致用的地主改革家一代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派与革命派一代之间，加上与之并存的以重商思潮（包括后期的实业救国论）所代表和体现的近代商业启蒙思想家一代（他们中许多人往往同时具有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多方面的启蒙思想），这样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才能真正较为完整和连贯。

产生于19世纪中晚期的中国近代重商思潮，与西欧近代的重商主义并不完全相同，它是社会转型时期一种更为复杂的思想体系，有着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虽然它与明清的早期重商思想和嘉道年间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历史渊源关系，但更多是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外来思想的影响，基本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尽管在最初阶段与西欧重商主义类似，晚清“重商”论者所强调的“商”或“商战”，主要指在流通领域和对外贸易中与国外商品展开竞争，仿效列强，“以商立国”，“以商强国”，改变既往重农抑商的政策，走重商之路。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加深，“商”本身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内涵，实际上成了“经济”或“实业”的代名词，延伸到“农”、“工”、“矿”、“交通”诸方面，越到后期，“工”的作用越发突出，实际已演变为“重工”或“重实业”。正因为如此，就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来看，稍后兴起的“实业救国论”其实也可以包括在广义的重商思潮之中，是重商思潮的后期表现形式。诚如郑观应所言：“商之义大矣哉！”^②对重商思潮的探索，要更多关注“商”在中国语境下的丰富内涵以及许多言外之意，不能简单“在商言商”或就商说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重商思潮中有一种“连环套”式的思维，层层放大，而涉及社会改良与发展的方方面面，“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③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由此，重商思想又成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酵母’，其内涵包括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因‘通商’而触发的一系列重要经济社会问题的连锁式回应”。^④这里所谓“连锁式回应”，实则为与“通商”和“商战”相关联的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各领域的变革与反思，以及这些反思在社会各阶层包括普通民众中所激起的反响。这样，就将重商思潮与近代启蒙勾连起来，使之成为近代启蒙的重要环节，以及各种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想承接转换的重要平台，其中，

① 参见萧萐父：《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7页。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07页。

③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④ 缙文：《发展经济学的滥觞：晚清重商思想三题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尤其为以“救亡”为中心的经济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和迅速普及开启了大幕。^①

二、近代商业启蒙的演进及其主要内容

以重商思潮为标志的近代商业启蒙是一个不断递进的发展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中，重商的内涵及其侧重点各不相同，由此商业启蒙的内容和受众面也各异。大体而言，近代商业启蒙经历了兴起（19世纪60—90年代）、嬗变（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深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当然，三个阶段的商业启蒙思想内容在实际历史中有时是并存或交叉的，但仍能观察到其中层层递进的发展趋势，以及商业启蒙思想的不断深化和普及。

第一阶段：近代商业启蒙的兴起（19世纪60—90年代）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尽管清政府发起了所谓“自强运动”，力图抵御外侮，挽回利权，意味着自上而下“重商”的开始，但30年过去，鸦片战争以来所丧失的利权不仅没有挽回，反而还在不断地丧失。这在中国有识之士之中激起极大的愤慨，同时也引发了深度的思考。1894年郑观应刊行《盛世危言》，首次系统阐释了“商战”思想，以“商战”为口号的重商思潮遂达于高峰，同时也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波商业启蒙大潮的汹涌而至。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正式出版后，很快便受到各方高度重视，“都中各处求者”，“络绎不绝”，发行量也极其可观，先后于1895年和1900年修订再版，“闻各省书坊辗转翻刻，已售至十余万部之多。早识先几，朝野称赏，何风气尚未大开乎？”^②

这一时期的商业启蒙主要围绕“重商”与“商战”展开，首先强调的还是商业和商人在“今世”的极端重要性，对传统社会中“重农抑商”的政策和“轻商”、“贱商”的观念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此又以维新派思想家陈炽的言论最为典型。在陈炽看来，要改变中国贫弱的现状，必须通过通商惠工，振兴商业，“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券也”。^③与陈炽类似的重商主张，有王韬提出的“恃商为国本”，^④以及薛福成提出的著名的“商握四民之纲”的观点。^⑤

① 就研究方法而言，重商思潮与近代商业启蒙运动的关联性研究，又可使重商思潮研究从单纯的思想辨析推向思想与社会的双向互动研究，从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单向性研究推向对广大商人和一般普通民众的研究，从各种重商的思想主张推向对这些主张的实现途径和社会效应的研究，简言之，由虚而趋实，由一般思想议论而落实到社会行动探索。这种社会学取向的研究，在既往对重商思潮的研究中似仍注意不够。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337页。

③ 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0、98页。

④ 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弢园文录外编》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页。

⑤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7页。

在启蒙史意义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启蒙思想家们的重商思想业已在商人中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和回应,通过对抑商、轻商传统的批判,近代中国商人也逐渐开始摆脱长期形成的自卑感,变得越来越自尊与自重。商人们将自己的经商与国家的富强相联系,认为“商业无论巨细,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并由此而生发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自豪感,不再视经商逐利为低人一等的旁门左道。^①有人甚至认为经商的人具有“天下最有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甚至能够称得上“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别的再也没有这种价值”。^②话虽说得有些极端或过于夸张,但却透露出因时代变迁而体现出的新兴社会力量的自信与抱负。

这些已然汇聚成流的尊商、重商意识,对刚刚迈入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它使中国几千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抑商、贱商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近代工商社会发展趋势相符合的重商思想逐渐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重要影响。检阅晚清商会档案文献,诸如“今商界风气渐开”、“商智日开”、“近今风气已开”等字眼触目皆是。^③也有直呼当今为“重商时代”,商人“皆当自认为国商”。^④还有人称“今日之天下,故一变而为重商主义,商人之力足以操纵天下之权利”。^⑤可见,重商思潮开社会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蒙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并成为诸多近代经济思想意识的触发器,诸如与“商战”密切相关的近代商人“利权”和“权利”意识的形成,便是“重商”的思想成果之一。

“商战”论的产生,直接导源于近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利权”的大量外溢,而“利权”的争夺,又是“商战”的核心和关键。^⑥商人们意识到“能于外洋收回一分利权,即为国家增长一分势力;能于商界多占一分位置,即为国家多获一分光荣”。^⑦在争利权的同时,商人也开始强调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和经商权利,呼吁政府加以保护、扶持,即所谓“保商权”,“我国之贱商,数千年矣。……不保商而扰

① 《兴商为强国之本说》，《商务报》1904年第8期（又载《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

② 《经商要言》，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890页。

③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4、135、730页。

④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3页。

⑤ 林作屏：《商箴》，《绍兴商业杂志》第5期，1910年6月。转引自冯筱才：《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

⑥ 《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奏折》，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166页。

⑦ 《兴商为强国之本说》，《商务报》1904年第8期（又载《东方杂志》1904年第3期）。

商，不利商而剥商不止”，“无怪乎商权常落外人之掌中”。^①如何才能“保商权”呢？薛福成提出了设专官、兴公司、励新法、杜伪品、改税则等五项“保商”措施。^②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借鉴西方的成功做法，提出了中国近代商业制度的基本框架，以适应“商战”时代的需要。

可见，以“商战”为核心的重商思潮不仅将“商”的重要性推到事关民族生存的战略高度来评价和认识，与后来勃兴的民族主义思潮有着渊源关系，而且围绕对“商权”、“利权”和“权利”的思考，更广泛涉及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商人社会地位、商人自由经营权利、外贸保护主义、振兴工商政策、国家主权意识、商业法律观念等一系列的近代思想启蒙问题。尽管这只是思想启蒙长过程的开端，但许多近代思想史的题中应有之义都大致包含其中了。

第二阶段：近代商业启蒙的嬗变（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

这一阶段商业启蒙的特征是由“重商”向“重工”转变，“工战”和“实业”逐渐浮出水面并成为重商思潮的核心。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重商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商”的概念的泛化和拓展，此时之“商”，既不完全等同中国古代之商，也不等同于西方重商主义时代之商，而从一开始就包含有“工”的因素，“工商”往往连带加以考虑。如薛福成提出“商握四民之纲”，但晚年又有“工体商用”的思想，“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③连主张“商战”最力的郑观应也认为应“以工翼商”，“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④

不过，对启蒙思想家而言，真正认识到“工”比“商”更重要，使“工战”的呼声盖过“商战”，还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标志则是“实业”一词的大流行。

清末状元资本家张謇是较早认识到“工”的作用胜过于“商”的人士之一。早在1895年，针对当时还很流行的重商思想，张謇曾指出外洋富强之本在于工。^⑤1905年发表的文学作品《市声》第34回中，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工战”的口号，“学界的口头禅，都说现时正当‘商战’，据兄弟看来，现时正当‘工战’世界”。^⑥

① 《论中国商业不发达之原因》，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68页。

②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616页。

③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482页。

④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8页。

⑤ 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⑥ 转引自杨国明：《晚清小说与近代商业社会》，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3年，第12页。

1906年,章京柏锐也提出:“广兴教育,以培人才,以为工战之基。”“工战”口号的提出,表明商战思潮已出现一个重大的思想转折,即由重商向重工的思想转换。从现存商会档案中,也可看到“重工”和“工战”思想对商人的直接影响。如1905年拟定的苏州商务总会《试办章程》中,便特别指出:“农、工、商三者实相表里,今商界风气渐开,农、工尚少讲求,顾工与商尤有直接之关系,工以商为尾间,商以工为源头也。……工固不可不重。”^①

这种“重工”的呼声在当时并不孤立,受1894年甲午战后外国资本投资狂潮的刺激,人们逐渐挣脱“以商立国”的重商主义的束缚,经济思想益发逼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以机器生产为代表的近代工业及其经济社会组织形式。近代工业化思潮呼之欲出。最早意识到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的近代启蒙思想家有梁启超、康有为等人。1897年,梁启超就曾提到,“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②1898年,康有为主张要“成大工厂以兴实业”,将“定为工国”作为“国是”。^③这种朦胧的工业化意识,随着20世纪初“实业”一词的广泛流行,已俨然成为近代商业启蒙思潮的主流。近代中国“实业”一词的内涵,既是“商”的扩充,也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工”,是一个内容相对芜杂、兼容并包的经济新词,是对农工商等生产和流通事业的总称,但又首先指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经营的近代工业。张謇曾说过,“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④时人则进一步阐释,“夫实业者,国民资赖以生之物,而国家之血液营养也。实业之盛衰,原为国民生计之舒惨所系,亦为国政隆污之所系”。^⑤

从鼓吹“实业竞争”到力倡“振兴实业”,再到“实业救国”论,当时的中国报刊杂志上充斥着有关“实业”的宣传和议论,实业似乎已成救世的灵丹妙药。“实业之兴衰,关于国势之存亡是也。”^⑥张謇和孙中山皆为“实业救国”论的力倡者。张謇认为只有通过振兴实业才能救国救民,“救穷之法惟实业”。^⑦为此,他提出著名的“棉铁主义”,试图通过重点发展棉纺织和钢铁业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实业。孙中山也认为,实业建设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发展实业,乃振兴中华之本”。^⑧

①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第730、731页。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③ 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5—227页。

④ 张謇:《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5卷(上),第151页。

⑤ 《实业救国之悬谈》,《东方杂志》1910年第6期。

⑥ 《论实业所以救亡》,《东方杂志》1904年第8期。

⑦ 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第38页。

⑧ 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附:同题异文),《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1页。

为此,他专门拟定了宏大的《实业计划》,拟通过重点发展铁路、公路交通和港口,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张謇的“棉铁主义”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互为补充,为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化指出了具体路径,是晚清以来重商思潮发展的高峰,也是“商战”、“工战”和实业思想的集大成者。^①在商业启蒙意义上,张謇和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分别实现了商战思想、实业思想、救亡思想、改良思想、革命思想的大汇聚、大整合,初步回答了中国工业化和近代化如何实现的时代课题,为后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十分值得进一步研究其在思想启蒙史上的意义。

第三阶段:近代商业启蒙的深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

在这一阶段,随着重商思潮的进一步演化,商业启蒙由“重商”、“重工”向范围更广的“重学”即实业教育和实业观念的培育转变,更深层次的“学战”使近代商业启蒙得以不断深化。

一些商战论者开始意识到,中国工商业颓萎疲敝的症结,在于经商者缺乏市场意识和企业精神,经营管理不善,自身素质低下,这些均有赖于教育的普及与发展。晚清商人也认为“时至今日,所谓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②兴商与重学密不可分,只有通过学战以开启商智,具有先进的商业观念和经商知识,才能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有关教育与实业的关系,又以张謇“父教育而母实业”一语最为中肯切要。张謇认为,教育是救国的根本,“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但实业又是教育的基础,教育需要实业的资金来扶植,“然非先兴实业,则教育无所资以措手”。^③

在“学战”思想的影响下,清末民初各地纷纷兴办商务学堂和实业学堂,极大地普及了商业和实业教育,也直接促成了对民众的商业启蒙。清末苏州商会成立伊始,即将兴商学、开商智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其章程中即以“研究商学、发明新理”为其宗旨之一,规定:“有人发起欲设立商业学堂或别项实业学堂者,本会当实力为之提倡扶助。”^④天津商务总会于1904年成立时,也曾在其章程中明文规定:“本会拟妥筹经费,设立商务学堂,造就人才,以维商务。”1906年又创办了中等商业学堂。^⑤各地商业和实业学堂的举办,反过来又极大促进了商业和实业知识的启蒙,“实业既有以提倡,风俗又从而改良,无用之财,皆归有用,一举而数

① 关于张謇与孙中山的实业思想的比较,可参见拙文:《孙中山与张謇实业思想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②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第30—31页。

③ 张謇:《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曹从坡等主编:《张謇全集》第3卷,第384页。

④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第30页。

⑤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48、86页。

善兼收”。^①

在兴商学的同时，各地商会还办有《天津商报》和《华商联合会报》等10余种商报，《天津商报》于1905年12月创刊，主要报道各地商务和市场消息以及商会的活动，每月出刊约1000份，“论说精详，商情洞达，有裨于商界诚非浅鲜”，以致“各商称颂”，“不胫而走，省城购阅者为数甚多”。^②《华商联合会报》于1909年3月创办于上海，系华商联合会办事处的机关报，1910年2月改称《华商联合会报》，每月出版两期，分寄海内外各商会。该报以“联合商队，振兴商业”为宗旨，起到沟通商情、唤醒商界、启迪商智的作用。^③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兴起的博览会、商品陈列所、博物馆等，也成为“学战”的利器，对近代商业启蒙意义甚大。有人指出：“推究赛会（即博览会）之本意，实系商学上事，并非商业上事。在开设会场之国罗致各国物产制造以供研究，使其工商人等通知各该国之学识理想好尚及其历年程度之比较，以开发其进步思想。”^④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第一次全国博览会——南洋劝业会所编之《观会指南》也曾指出赛会的最大功效是“实于精神上施以实物的教育，而养其兴业殖产之观念”。^⑤1909年武汉举办劝业奖进会期间，为了普及博览会知识和商业知识，办会者还特别印制了白话文宣讲书达5万多册，在武汉三镇广为散发，极大普及了商品博览会知识。^⑥

民国初年，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将其关注重点从革命转向实业建设，先后成立了20余个实业团体，通过办报刊、开演讲会和举办展览会等，专门开展有关实业尤其是铁道建设的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实业知识，收到很好的效果。如其中之一之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每逢周日晚上便举行宣讲会，内容则“注重学理”，介绍各种产品的生产方法，“听讲不限会员”，故“听讲者倍形踊跃”。^⑦在各种以宣传实业为主题的报刊杂志中，李文权等1910年6月在日本创办的《中国实业杂志》颇负盛名。该刊原名《南洋群岛商业研究杂志》，1912年改名为《中国实业杂志》，由中国实业杂志社编辑，改季刊为月刊，在东京出版，商务印书馆在北京、上海发行，1917年移至天津出版。该刊以“实业救国”为宗旨，分设图画、论说、译著文牍、传记、调查报告、来稿、访问等栏目，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外交、侨民、风俗地理等方面，尤以主张华侨投资、兴办实业、开展经贸调查、促进国际贸易、开展国

①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第730页。

②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162—163页。

③ 赵洪宝：《清末商会兴商学活动述论》，《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

④ 《前出使英国大臣汪咨农工商部论办理赛会事宜文》，《东方杂志》1907年第9期。

⑤ 《观会指南》，南京：南洋劝业会事务所，1910年，第96页。

⑥ 参见张廷海：《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上海：上海经武公司，1909年，第91页。

⑦ 《工业建设会进行》，《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第10页。

民外交为著名，人物传记多为介绍中外著名实业家，对各种商品陈列所、展览会、博览会的报道与论说亦极为详赡，可谓一部实业的百科全书。^①

可见，清末民初的商业和实业教育还是有相当规模和普及度的，其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失为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形式之一。

中国近代重商思潮的演变过程深刻说明，以“商战”思想为起点的近代商业启蒙经历了从商业到工业、从商品到制度、从物质到精神、从单一到系统、从实业到教育、从浅层到深层的复杂演变过程，“商战”——“工战”——“学战”的层层递进，恰好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的由浅入深，由物质到制度再到心智的认知逻辑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两方面的启蒙：一是商业、商品等物的启蒙，一是思想、观念、认知等精神方面的启蒙。物的启蒙导致对商品背后的商业制度、工厂制度等“制度文化”的认知；精神启蒙则导致对竞争精神、契约精神、平等观念、权利观念等工商社会新精神的认知。这两方面的结合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全面启蒙，意味着从封建等级社会向现代职业社会漫长转型的开始。

三、近代商业启蒙的意义与局限

以晚清重商思潮及其演变发展为标志的近代商业启蒙，是继明清商业启蒙之后中国又一次重要的经济思想启蒙运动，它上承明清思想启蒙之端绪，下开近代思想启蒙之先河，在思想史乃至社会史意义上，具有不可替代的过渡、中继性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与明清时期以“新义利观”和“新四民观”的兴起为主要内容的商业启蒙思想相比，^②近代商业启蒙不仅深刻反映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大变局”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冲击和影响，而且所涉及的思想内容也远为广泛和深刻，是中国思想、文化整体性近代转型的体现，也是“世运转移”、“新旧交替”的时代思潮变化使然。

首先，在启蒙意义上，同尊商、重商意识相适应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价值观念取向的重大变化，集中表现为对“义利之辨”的新诠释和近代功利型价值观的逐步形成。

在近代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人们对自古以来“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进行了更深刻的反省和更尖锐的抨击，与近代工商社会相适应的功利型价值观逐渐占据上风。有人大胆为“言利”正名，认为义与利根本上是不能够分开的，求利乃人生的

① 详见李文权：《三十七年自述》，《中国实业杂志》第6年第9、10合期；果鸿孝：《中国实业杂志》，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 关于明清时期的商业启蒙和商人精神的变迁，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

本能。^①也有人从“优胜劣汰”的天下大势出发，强调求利求富的功利型价值观对民族自强、保国保种的重要性。^②而何启、胡礼垣等维新思想家还特地将求利观念与鼓吹财富至上、个体本位至上等属于新兴工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挂上钩，如对待财富和财产的态度，他们提出：“凡事而能使人心悦诚服竭力而前者惟财。凡物而能令人取诸怀中割爱与我者亦惟财……除性善之外，则天下事事物物无不因财而动，因财而成者矣。”关于利与私，他们直言私在社会进步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今日言，则家不妨私其家，乡不妨私其乡，即国亦不妨私其国，人亦不妨私其人……如此则合人人之私以为私，于是各得其私，而天下亦治矣。”^③如所周知，鼓吹财富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个人价值第一，人人有追逐私利的权利，国家不得干预，这些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奉行的基本价值准则，从西方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边沁等人所倡导的功利主义思潮中，不难看到极其类似的思想主张。^④何启、胡礼垣等将之借用到中国，正是试图以近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取代传统的伦理型价值观，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近代工商社会的诞生而张目。

与根本价值观念变迁相一致的是商人竞争意识、合群意识、法律意识等方面的观念变迁。如竞争意识，人们业已认识到工商社会实则为一竞争社会：“今适届实业竞争最剧烈之时代，商也工也，投身商战之场。使有生货而无熟货，将何所挟持而为战胜之利器？”^⑤只有在竞争中才能求生存、谋发展，“竞争者，进步之原因也。对外而言，则我国当与他国竞争；对内而言，则我省当与他省竞争”。^⑥如合群意识，“中国商人素无合群思想，故数千年来，未占有历史之荣光者”。^⑦“今宜亟为合小以致大，联散而成聚，舍个人商业而营社会商业，舍家庭工业而营工场工业矣”。^⑧“而提纲挈领，保卫维持，俾商务日有进步者，实惟商会是赖。盖商之情散，惟会足以联之；商之见私，惟会足以公之”。^⑨正是这些认识促使商人联合起来兴办股份公司，创设工厂，筹建近代商会组织。如法律意识，“我中国商人，沉沉冥冥为无法之商也久矣！中国法律之疏阔，不独商事为然，商人与外国人贸易，外国商人

① 《争利失利说》，《申报》1890年4月12日，第1页第1版。

② 《中国政务日兴喜而论之》，《申报》1896年5月7日，第1页第1版。

③ 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5、413页。

④ 关于爱尔维修、边沁的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可参见G. 希尔贝克、N. 伊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童世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24—325、348—349页。

⑤ 魏声龢编著：《最新中国实业界进化史》，上海：点石斋书局，1906年，第124页。

⑥ 《成都商报》第1册，1900年，“论说”。

⑦ 《论商会倚赖政府》，《东方杂志》1904年第5期。

⑧ 《论组合》，《商务官报》1906年第15期。

⑨ 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第3页。

有法律，中国商人无法律，尤直接受其影响，相形之下，情见势绌，因是以失败者，不知凡几，无法之害，视他社会尤烈，此可为我商界同声一哭者也”。^①从这些认识中则可以捕捉到商人有组织开展商界习惯调查，发起拟订商法活动的思想认识根源。商人观念的种种变迁，体现出近代商业启蒙已通过价值取向的变化而影响到商人意识形态和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其意义十分深远。

上述与重商思潮相伴随的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的变迁，虽然主要体现在工商实业领域，往往与商利、商权、商法等相挂钩，但随着启蒙思想的扩展，常常又由启蒙思想家们推及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等更广泛的领域，引发更多的批判性思考。如1880年前后，重商论者钟天纬便已意识到西方富强的根本不只在“重商”，而更在于其“政教修明”、“律法最尊”，能够建立起“通民情、参民政”的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法律制度，这才是欧洲各国臻于富强的“大关键”处。^②1909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指出：“盖宪法乃国家之基础，道德为学问之根柢，学校为人材之本源。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③到20世纪初，这种思想业已在商人中引起比较广泛的认同，如有人认为，商人“无政治之思想，乏国民之精神，终无以争存于商战之世，独立于列强之间也”。^④也有人指出：“我商界不欲为立宪文明之国民则已，苟其有立宪国民之思想，则当先尽立宪国民之义务，而国会请愿之举，自不得不继续各界以行之。”^⑤这说明，在当时商人眼中，商业发展与政治发展已有莫大关系，商人已不可能游离于国会请愿之类的政治运动之外。

显然，商业启蒙同整个近代启蒙思潮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系整体性近代启蒙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且，这种启蒙实际上已从思想家的书斋走向广大的社会，一变而为不可阻遏的社会思潮和层出不穷的社会改革运动。

尽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近代商业启蒙也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与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想和早期启蒙运动相比，中国近代商业启蒙主要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发的，是商潮东渐所引发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反映，商战的目的主要在于御侮与救亡，手段则是对外贸易与阻塞漏卮。外发性特征，使中国近代商业启蒙一方面固然接续了明清以来的经世思想和实学传统，但另一方面又主要是从西方接受重商主义的思想启蒙。但可惜的是，这种启蒙毕竟是不系统的，有一种理论上的不

① 《上海商务总会致各埠商会拟开大会讨论商法草案书》，《申报》1907年9月10日，第1页第2版。

② 钟天纬：《综论时务》，《刳足集内篇》，1932年刻本，第34—36页。

③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11页。

④ 太孟：《商业发达论》，《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⑤ 《联合海内外华商请愿国会公告书》，《华商联合会报》第3期，1910年5月。

彻底性，许多来自于对西方或肤浅或深刻的观察。更何况西方重商主义经过 300 余年的演变，早已面目全非，本身就有早期与后期重商主义之分，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无法全盘引进。如马建忠的重商思想历来被认为是最接近西欧重商主义思想，但经过有关专家的深入分析，却认为他的重商主义与真正的古典重商主义仍有实质区别。^① 晚清以商战为口号的重商主义，其实是一种古典重商主义与近代自由贸易思想相混杂、西方冲击与经世思想相交错的混合型思想，目的主要在于挽救因外贸巨额逆差和白银大量外流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危机，使中国不致被西方列强所“灭国”、“亡种”。

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商业启蒙始终受制于急剧变化的救亡形势。为了适应救亡的需要，近代重商主义的内涵始终处于急速的过渡、转化之中，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很难形成为“思想定式”。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近代重商主义便走过了西欧重商主义 300 余年的思想历程，呈现出极其短暂又极不稳定的思想特征。在民族救亡的时代主旋律之下，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重商”、“商战”，到 20 世纪初年的“重工”、“工战”、“实业救国”，再到辛亥革命后全面的“实业建设”、“社会革命”，不到 60 年的时间，中国近代的经济思想发展和商业启蒙已经历了多次内容、主题变迁，但每一次变迁，都缺乏深度的思考和充分的实践，像一场场突如其来的春雨，刚刚打湿了地皮，就倏然停止了。这种思想启蒙的“跳跃式”发展和一波接一波的“思想快速接力”，其实也就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真实写照。

不得不承认，近代商业启蒙的“未完成时”特征，为现当代经济制度和商业道德文化的建设带来很大困惑和阻挠。商业道德文化是国民整体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中国商业道德文化和商业精神的再启蒙、再建设，这也是中国经济建设实现可持续和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

〔责任编辑：雷家琼 责任编辑：路育松〕

① 参见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00 页。亦可参见薛玉琴：《近代思想先驱者的悲剧角色：马建忠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87—88 页。著者业已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与其说马建忠是一位洋务专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启蒙思想先驱更为贴切”。（薛玉琴：《近代思想先驱者的悲剧角色：马建忠研究》，第 206 页）